政治科學論叢／第五十一期／民國 101 年 3 月／頁 1～50

政策網絡中的對偶互動及其解釋因素：

以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的菁英網絡爲例，1986-1992*

熊瑞梅**、王光旭***

摘　要

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研究焦點大多集中在行動者間的互動如何影響決策產出，鮮少探討是何種因素影響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以 1986～1992 年間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爲研究個案，以政策網絡中資源互賴（resource dependence）的觀點爲研究架構，調查訪問 78 個關懷解嚴後台中都市發展重要事件的行動者，蒐集其對 8 個都市發展關鍵事件的看法與立場，及彼此間互賴關係所構築的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諮商網絡、和資源交換網絡。在方法上，本研究先從四個社會網絡計算出行動者間社會關係的最短距離（path distance），再進一步將其轉換成行動者間 6,006 組對偶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的最短距離，透過相關，探討網絡成員的特質、部門、派系同異質性，以及運用邏輯斯迴歸嘗試探索何種因素會影響行動者間關係形成的機率。研究結果發現：第一，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對偶關係的最短距離和信任網絡對偶關係的最短距離相關度較其他者高。再者，解釋四種社會網絡對偶關係存在機率的模型時，國民黨、政府部門內部社會網絡聯繫頻繁；張

* 論文曾發表於 2010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2 月 4-5 日，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承辦。會中感謝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陳世榮教授給予的建議，也感謝審查過程中三位論文審查人所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然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E-mail: hsung@nccu.edu.tw。

*** 通訊作者，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 guangxu.wang@gmail.com。

收稿日期：100 年 1 月 24 日；通過日期：100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派內部較常出現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聯繫，賴派內部較多技術諮商和資源交換的網絡聯繫。第三，派系間存在著頻且繁異質性跨界的弱聯繫互動關係，顯示台中市派系間的社會網絡並非封閉對立，在都市發展政策中跨派系建立網絡聯繫的機率較高，對偶互動的關係距離也較短。第四，都市菁英出現了教育程度低的菁英偏向與教育程度較高的菁英建立關係的現象。換言之，社會網絡中無論是自身或對方在都市發展政策網絡上具備影響力聲望，都會有較高的機率建立兩者間的互賴關係，且此兩者關係距離也偏短。由此可見，在政策網絡中與具備影響力的行動者建立互賴的對偶關係具有實質上的效益。

關鍵詞：社會網絡、政策網絡、對偶關係、都市政治菁英、同質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金溥聰直言：我不收買派系。選舉過程中多次的工作會議上，（台中）地方黨部一再反應，「再不下來（指資源），地方派系壓力很大。」他坦言，國民黨不若過往，可以有很多資源可以分配到地方，必須有不同的思維面對選舉。
>
> 秦蕙媛、管婺媛（2010）

壹、前言

都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會因不同的都市政體（urban regime）（Stone, 1989；Hall, 2001），發展出決策菁英間獨特的治理結構與行動機制。從區位生態發展的角度來說，每個都市的區位條件形塑了都市發展的功能體系，但區位條件往往又受制於地方或中央政治菁英的決策過程，導致都市利益與權力結構的壟斷，菁英間穩定的治理網絡主導了都市的成長與發展（陳東升，1995；王振寰，1998）。比如說：劉銘傳曾將台中做爲台灣府的政治中心，但日據時代及國民黨政府基於統治上的需要，卻將台北做爲政府中心所在地，展現了決策菁英對於區位規劃的強烈意志。從都市歷史發展的脈絡來思考，這些行動者與事件交織而成的歷史因素也已部份決定了一個都市歷史發展的特殊功能。換言之，要瞭解都市在歷史發展中某個特殊政治體制階段的都市政策與規劃，是如何影響後來的都市發展，必須從當時影響都市發展重大政策事件的菁英決策結構來分析（熊瑞梅，2001；王光旭，2002）。

從台灣民主化與都市發展的角度觀之，在 1987 年政治解嚴後，台灣地方社會自主性逐漸增加，許多的社會團體開始蓬勃發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又加上政府因爲財政危機與治理上的需求，開始推動向新公共管理主義（New Public Management）（Kaboolian, 1998）靠攏的行政改革運動，使得過去尋求由政府獨大的治理模式，逐漸走向「小而美」或「社會優於國家」的理念，展現了與社會共治的可能，利益的觀點也趨向多元化。換言之，相較於過去，就現實的政策環境而言，多數國家正面臨的傳統統治權力遭受侵蝕的問題，再加上地方化（localisation）與分權化（decentralisation）政策的浪潮，地方的議題或政治事件愈來愈受利益團體與政府行動者交互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運作的機制影響，導致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角色有退卻的趨勢。對政府而言，目前無論是政策的討論與規劃，或是公共服務的遞送，無法僅止於討論政府權力的大小與政策工具的優劣，政府公權力的運作環境，正在被非政府的行動者所穿透（王光旭，2008），展現的是一種更爲分散且權變的治理格局。以台灣的發展來說，台灣地方政治權力在解嚴前是受到地方派系的影響（文崇一，1989），國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是一種類似恩庇侍從（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Kaufman, 1974；Wang, 2011）關係的存在，政府爲了掌控統治權與地方派系形成穩定的交換關係，地方派系等於國家統治集團內部爲了穩定社會秩序的一份子；解嚴後，一方面在快速開發的都市郊區，地方派系與財團聯盟炒作土地利益，形成金權城市的空間結構特質（陳東升，1995；王振寰，1998），而另一方面社區意識與公民參與的抬頭，又加上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波助瀾，也導致社區民眾與組織開始組織性的參與公共事務。

以台灣大都市的區域發展而言，緊鄰大都市邊緣的郊區，或原本屬於都市閒置空地的重劃區，在解嚴後都面臨強調都市成長（growth machine）（Logan and Molotch, 1987）意識型態菁英介入與炒作，形成的是由地方派系與財團掛勾加速資本積累的投機型城市。在缺乏政府規範，而由地方派系與財團的土地菁英參與權力競爭的影響下，區位空間的發展格外混亂無序。熊瑞梅於 1991～1992 年國科會研究計畫《快速成長的郊社區之菁英影響力結構及居民社會資源》的調查中，在透過深入訪談及參與觀察社區解決社區問題的會議，發現在快速成長的郊區，區位功能分化幾乎雜亂無章（熊瑞梅，1992）。深究其因，一個結構性的因素是政府的都市計畫或鄉街計畫與村里區位的快速成長不協調所致。換言之，政府在解嚴後對都市發展的控制能力，正因爲地方派系與開發商的介入在不斷的消退，原本規範都市空間功能使用的法規不能適時產生管制的效果，故使得都市菁英影響力網絡有足夠的空間來影響都市空間的發展，並從中累積財富，掠奪土地利益。此外，台灣都市內部的區位結構發展，也往往受到都市計畫審議機制的影響，而都市計畫的審議結果又往往取決於市長與地方派系和財團菁英三者間權力結構的影響（王光旭，2005b）。檢閱過去有關台中市都市計畫或土地政策的研究（邱瑜瑾，1996；賴志彰，1997；王振寰，199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熊瑞梅，2001；王光旭，2005b），大多持著台中市的土地重劃與都市發展的確造就了利益共榮都市成長機器的看法。例如：台中市自 1979 年曾文坡市長以來，大批開發重劃區的都市計畫策略，使得重劃區吸引高教育與高所得的人口（熊瑞梅，1992），故都市計畫的結構變遷也快速地改變了區位結構的變遷，也讓台中市的都市重劃有很重的人治色彩，成爲地方菁英奪取土地利益的平台。台中過去都市菁英都大量地介入重劃區的開發事件上，使得非正式的網絡關係成爲解決土地問題的最佳手段。

多元社會下都市發展政策網絡中的決策菁英，往往在不同的都市政策議題上抱持不同的利益與看法，加上他們之間彼此原有的私人關係和制度位置，故出現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連結。從公共行政理論發展的角度而言，無論是誰宰制了都市政策，這種分散化治理的現象反映了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政策所產生的複雜性，也導致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Goldsmith and Eggers, 2004；Koppenjan and Klijn, 2004）或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Laumann and Knoke, 1987；Smith, 1993；Klijn, 1996；Rhodes, 1997；王光旭，2005a；史美強、王光旭，2008）等治理形式觀點的興起。事實上，在近期地方治理的文獻當中，上述這些概念一直不斷的嘗試在都市或地方治理的研究中操作化（Agranoff and McGuire, 1998；2003；Goss, 2001；Marcussen and Torfing, 2003；Bogason, 2004；Hall and Montin, 2007；王光旭，2008），以累積其在地方性政策過程的解釋力。政策網絡長久以來被使用於描繪多元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如何影響政策結果，反映了政府與學界在複雜的政策環境中詮釋政策現象的理論需求，然過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行動者間的互動如何影響決策的產出，鮮少探討是何種因素影響了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除了透過政策網絡的觀點來討論影響台中市都市發展的菁英網絡結構之外，更要彌補過去理論上研究的空隙，以社會網絡爲分析工具，企圖分析解嚴後的台中都市政策菁英行動者在不同類型的社會網絡連結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從過去影響台中市區位發展重大決策或政策事件的菁英網絡中，欲探索台中市的都市政策菁英間（建商、民間利益團體、專家、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等不同部門的行動者，在不同網絡中彼此的連結關係爲何？呈現了什麼樣的利益交換結構？又什麼因素影響了此結構的形成？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針對解嚴前後影響台中市都市發展重要事件的關鍵行動者進行調查及深入訪問，獲取 78 位地方菁英的 4 種社會網絡資料，[1] 並進一步分解成 6,006 組政治菁英間對偶關係距離的資料。最後企圖解釋菁英行動者兩兩在社會網絡關係中彼此在空間距離上的遠近，或彼此在各類型網絡成員間關係形成與否的影響因素爲何？並分別使用卡方和邏輯迴歸來解釋之，最後提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都市政治分析觀點的再定位

有關都市發展政策的文獻，過去多圍繞在區位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的論戰，然這類文獻也多屬於從宏觀的角色來剖析促使都市發展的動力。人文區位學家強調區位系統（人口、組織、環境與技術）的市場力量是都市累積成長的演化變遷機制（Hawley, 1950；Park, 1952）；而馬克思主義學者，特別是從都市社會學或都市政治經濟學角度的學者，強調都市政治就是追求經濟成長的政治，認爲人文區位學者並沒有掌握在歷史脈絡下社會結構的動力，特別是階級結構的矛盾所形成的權力衝突過程在都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Molotch, 1976；Mollenkopf, 1983）。兩種理論的共通點都是把經濟的力量視爲是促使都市發展原動力，前者強調人類社區存在著一個區位系統發展的平衡法則，例如：區位競爭、分化、優勢和整合等原理；但後者否定的功能與平衡的原理，強調經濟生產活動所形成的階級，再製了這些菁英在空間消費裡不平等的矛盾現象，而這種都市空間結構矛盾與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則是都市發展很普遍的現象。

然而，前述兩種理論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面向：無論是功能平衡的區位系統還是階級衝突的政治經濟力量，其實都是一種看不見（invisible）的力量，這些力量要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需要憑藉中介機制（mediating

[1] 此 4 種社會網絡是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諮詢網絡、資源交換網絡，後續會有進一步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chanism）來實踐。這些中介機制的存在可能是正式制度，也可能是各種行動者：國家、企業、政治菁英、市民等等的互動所形成的網絡關係。這些行動者在實踐這些平衡或剝削的運作法則時，是透過了社會關係的運作，而這些社會關係的運作，也往往受到了歷史、文化、政治等制度脈絡的結構限制。因此，Gottdiener (1987) 解開了新馬克思主義中政治部門的運作由經濟邏輯決定的死結，使研究者把政治部門對都市空間發展的影響，當成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探討。而 Jessop (1990) 的國家理論基本上參考了 Laumann 的系統論觀點，認爲社會任何一個體系不可能完全佔有優勢的位置，並且能充分的支配其他不同體系的運作方式。換言之，從上述兩者對都市空間的討論與修正，很明顯的從原本宏觀的層次進一步關懷到政治系統中行動層次的問題。而後來在國內都市社會學或都市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中（陳東升，1995；王振寰，1998）所廣爲引用的 Logan 與 Molotch (1987) 與 Stone (1989) 等學者，便更爲強調都市菁英的結盟關係在都市發展的影響。

都市菁英在都市政策的社會網絡鑲嵌性與互動邏輯有何特殊性？人們執行有目的的行動是鑲嵌在具體且正在進行的社會關係系統中，文化規範等行爲準則是要在日常生活實踐，從彼此的互動中共享規範，互相約制而成。支配我們慣性行動的機制往往是一個由非正式規範與正式制度，並透過行動者日常生活互動與實踐，漸漸形成共享的行爲腳本（script），這個由生活經驗中體驗學習的行動腳本，是型塑行動者的慣性行爲結構的機制之一。毫無疑問，這個腳本也是在社會網絡的結構特性上被型塑，若從政策網絡的角度來看，也就是除了正式政策合法化的規則之外，尚有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結構會影響著政策的產出與執行，所以參與政策過程的行動者，每個人思維與行動均具有社會性的基礎，行動上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例如：都市事件的處理考量，過去有權力的菁英若多集中在派系行動者上，而這群派系菁英彼此又有來往，互相掩護以奪取私利，在都市政策的決策上，就容易有派系利益爲優先，公共利益次之的共識。之後的地方菁英若繼續介入都市事務，也會由過去社會網絡互動經驗中，模仿學習，承續這種派系利益大於公共利益的社會互動與資源交換的行動邏輯。

過去台灣從事地方政治研究者，多半將理論解釋的焦點放在地方派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侍從主義與利益結盟上（陳明通，1990；陳東升，1995；邱瑜瑾，1996），這樣的解釋邏輯與公共行政學界對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或地方治理抱持的浪漫情懷往往並不相符。換言之，政府在都市發展政策的角色並非必然是理性、民主與重視與民溝通的，也非必然的是站在平等互惠的角度上，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以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Hodge and Greve, 2007）的方式促進地方發展，而是在權力不對稱的互動下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共同體，有效分配彼此利益。解嚴後，國民黨對於地方選舉與政治資源分配，已不再具有壟斷的優勢，也難以維持原本恩庇侍從的關係，地方派系背景的菁英必須熱心投入地方社區議題與地方服務，建立自己的社會網絡人脈，以獲取民間資源和地方影響力。故討論解嚴後台灣的地方政治，若仍使用傳統派系侍從主義的規範化約觀點已不適宜，而採取政治人物各自結盟型塑自己的政治活動網絡的觀點似乎較寫實。地方政治菁英的政治生活與行動除了受政黨、公共部門、或派系制度角色的限制外，其行動動機大多在追求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不斷地結盟與改變結盟的對象是經常存在的現象，許多政治行動者不僅在追求長期利益，也在追求短期政治或經濟投機的機會主義。在台灣的政治行動者，有如台灣中小企業的協力網，彈性結盟，強調短利與選票的政治人物居多，強調前瞻性、長久性的公共利益者少（熊瑞梅，2001）。例如：台灣的地方到中央的菁英，普遍相信土地開發等於好的空間使用的成長意識型態，權力網絡中居優勢的政治菁英，往往可利用其豐富的社會網絡資源，影響相關決策行動者，產生有利於政治菁英積累其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土地政策（王光旭，2005b），這種將利益積累的合理性制度化的決策模式，會讓市民大眾付出很大的成本。且規劃良好具有公益性質的制度不見得能取悅大眾，也不見得能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公信力，有時候更會導致地方政治菁英的反彈。例如：在都市政策中增高容積率或住宅區變更爲商業區的強制回饋比例，沒有地主與建商喜歡，也就沒有議員敢支持，政府官員更是不敢輕易地實施。

解嚴後台灣的都市發展，普遍盛行愈開發愈好的成長意識型態。這些地方菁英強調充分開發都市的土地，藉以創造都市的財富，並吸引更多的人移入都市。這批菁英不乏政府官員、地方派系、財團與其他掌握資源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力菁英，也因爲都市開發與土地利益的奪取出現官商結盟的現象（陳東升，1995；邱瑜瑾，1996；賴志彰，1997；王振寰，1998；熊瑞梅，2001；王光旭，2005b）。至於這些地方權力菁英如何利用社會關係交換資源？交換資源後又如何再製其權力，則是用網絡分析較可周延地表現出來。都市地方菁英往往參加許多社區或社團組織，藉著成員重疊，互相連鎖，或資源交換，達成合作聯盟的效果。Whitt (1982) 研究美國加州捷運及芝加哥博覽會受制於地方成長意識形態之菁英的結盟團體，但他們之間未必團結一致，會因爲不同事件的利益差異，產生不同的結盟關係。再者，成長與反成長團體間在意識型態上，會展現不一致的都市發展價值觀，同時他們在都市事件上態度也往往不同，容易形成相互對抗的互動，導致都市發展的衝突（王光旭，2008）；即使是商業利益團體，由於利益分配不均，資本階級內部也會出現對立的現象，導致集體合作網絡的崩盤。但在台中市的都市發展政策上，強調都市成長的團體，勢力仍然是大於強調環境品質和都市管制觀點的菁英行動者（熊瑞梅，2001）。

二、政策網絡在都市政治研究的貢獻

政策網絡的分析方法對都市發展的形成有何貢獻？自從 Logon 與 Molotch (1987) 提出都市成長機器的模型後，許多的研究者多半用個案研究的方式，將都市成長機器中，重要的地方影響力團體或菁英參與都市事件的發展做動態的描述，雖然沒有明確的引用網絡作爲分析的概念，但分析的主體卻明顯的聚焦在都市菁英的互動過程與關係結構對都市發展的影響。例如：Savitch (1991) 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選擇紐約、巴黎與倫敦三處各兩個成功與失敗的都市事件，並用事件發展的個案描述方法，去掌握事件過程中運作影響力結構的模式。由資料顯示，三個都市影響事件的權力結構完全不同：紐約是自由的多元主義，亦即紐約都市事件的運作所呈現的影響力機制，是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利益團體涉入其中，而非由少數利益團體完全控制所有的都市事件。另外一個極端的模式是法國巴黎，其呈現的權力結構模式是偏向統合主義的結構，亦即由專業中立的都市規劃公部門或專業團體主導，一般利害關係人的私部門，非營利組織，或民意代表等則配合核心的都市專業機構。居中的模式則是倫敦，偏向自由統合主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政府與專業部門擁有主掌統合的力量，但多元利益團體不滿與抗爭的力量也會被決策核心團體考量，故相對於巴黎，倫敦模式則較有彈性。

Whitt (1982) 也曾使用權力結構的模型來解釋加州捷運與高速公路興建過程中權力結構的運作模式，其融合多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爲加州的都市事件中，除了多元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在運作之外，也可看出階級的力量在影響。然從分析中，其也反省理論的應用，並指出：組織間的運作對瞭解都市事件運作的本質有實質的助益，其認爲將政策網絡分析應用在都市成長機器的理論上，更能夠將 Logan 與 Molotch (1987) 的理論落實到行動結盟的層次上。換言之，都市成長機器是各種政治權力運作的結果。Galaskiewicz (1989) 在研究都會菁英的權力網絡時，把重點放在國家、私部門、和社區三個層次的組織行動者與資源動員網絡的機制。他發現都市社區若鄰里組織越多，或都市社區資源動員組織若有聯邦層次的機構，則越能快速反應制度環境的變遷，及採取有效的資源動員集體行動。Knoke (1990) 在其集政治網絡理論大成的著作，以及都市社會學家 Galaskiewicz (1989) 及 Whitt (1989) 的作品中，還有政治與公共行政學者 Gerber, Henry 與 Lubell (2010) 探討美國加州區域規劃網絡的文章，都不約而同的提出組織間或政策網絡分析對於理解都市發展在方法上的貢獻。

政策網絡研究應用在解析都市政治的操作化模式，除了得益於國家政治菁英層次的政策網絡分析（Laumann and Knoke, 1987；Knoke and Pappi, 1991；Knoke et al., 1996）與組織行爲學者（Krackhardt, 1992）甚多，也吸取了有關社區權力菁英如何解決社區公共事務經驗研究成果的經驗（Laumann and Pappi, 1976；Laumann et al., 1977；Galaskiewic, 1979；Laumann and Marsden, 1982）。作者依據 Laumann 與 Knoke (1987) 在《組織國》（*The Organizational State*）（1987）分析政策場域（policy domain）的方法，以及 Krackhardt 在測量組織內決策權力關係所使用的方法，通常社會網絡結構的研究會涉及四種關係型態：一是信任關係、二是諮詢關係、三是情報交換、四是情感支持（Krackhardt, 1992），而且每一種網絡關係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這四種網絡關係也通常被視爲是進行網絡分析的基礎。然而，除了上述網絡分析的類型常被作爲分析關係的基礎外，依照研究性質的差異，亦可採用不同的社會網絡型態。據此，本文在政治菁英間互動網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絡關係的測量上，也會根據上述原則，並配合對於實際政策過程的瞭解，來定義 4 種適合的關係網絡進行分析。

按照集體行動體系理論（collective action system theory）（Laumann and Knoke, 1987），政策的行動者要能對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力，必須建立在政策決策的過程是需要對政策有興趣的行動者，在政策網絡中賦有資源且能操縱資源，並且在都市事件的參與上有一個經常性且穩定的資訊交換網絡，這個訊息交換網絡要演進到行動，則尚需透過信任及專家技術的關係來選擇訊息，有了可靠的訊息，地方政治菁英便能判斷如何採取行動，透過對重要訊息的討論與交換達成共識並解決衝突，並透過人與錢等社會資源的交換來影響決策的過程與結果。除了資源交換網絡之外，Laumann 與 Knoke (1987) 並進一步將溝通網絡區分爲一般事務討論與信任溝通兩種關係，在本研究中，由於都市計畫的都市事件具有專業性，較具專業性的行動者可能在都市發展的場域中較具專業的影響力，因此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又可以區分爲一般性都市事務的討論關係與技術法規的諮商關係。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在政治行動中，由於決策與政治是鑲嵌在具體且穩定的社會關係之中，信任關係反而是許多政治菁英間交易的基礎。在政策過程中不論是資訊交換或資源交換，政治行動者比較偏向與有信任關係的行動者來往，長久以爲會形成所謂內聚力且排他性強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Rhodes and Marsh, 1992），穩定化的關係與共享的價值規範與溝通系統，能有效降低溝通的成本與促進決策的產出，也有決策環境制度化與政策變遷間因果解釋的意涵（王光旭，2009）。這些經常性的社會網絡，在決策過程中是除了正式制度影響力之外，最不可被忽略的慣性結構，也就是俗稱的「潛規則」。進言之，都市重大事件的決策過程中，關懷這些都市事件利益者，必然企圖利用平時的私交或透過許多認識的關係，尋求對政策事件的結果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觀察到地方政治行動體系是立基於何種社會關係網絡基礎，而這種社會網絡又如何與菁英間的利益網絡交互重疊在一起。綜合上述，本文將對都市事件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在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法規諮詢網絡、與社會資源交換網絡兩者關係的距離與形成的相關變數進行探討。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網絡互動的分析層次

政策網絡的研究依研究目的與資料蒐集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分類。一般說來，從資料蒐集的方式與分析的目的來區隔，大致上可以區分爲兩大類（Borgatti, 1998）：一是以個體爲核心的自我中心網絡（ego-centered networks），分析的重點爲個體在網絡中的連帶與位置；其次，是以完整的網絡（whole networks）爲分析的焦點，強調網絡結構中集體成員的結構分佈，在政治學領域中多應用來分析權力的結構。若更細緻的從分析的層次區隔網絡的研究，則又可進一步區隔成 4 種分析層次（Knoke and Kulinski, 1982），除了自我中心網絡與完整網絡的分析之外，還可以區隔爲對偶網絡（dyad network）與三角網絡（triad network）的研究。對偶網絡的分析是以一對（pair）行動者間的連結爲研究主體，除了分析行動者各自的屬性與連結關係外，行動者各自的屬性對對偶關係品質的影響，以及對偶關係演變的問題，都是觀察的重點。三角網絡則是以三個行動者間的連結關係爲研究主體，關注三者間是否存在傳遞效果，或是兩者間的關係是否會受到第三者的影響。

一般說來，政策網絡的研究大多討論整體網絡結構對決策產出的影響，但對於最基本的關係結構形式－對偶關係，卻明顯的不足。對偶關係是討論組織間關係最簡單、最基本的溝通形式，也是組織間關係結構形式理論的基礎，這種關係形式在經驗研究的可能性是最高的（羅珉，2008：18）。對偶關係的優點在於可以進行兩個個體間關係的適應性、相似性與歧異性的分析，因而可以有效的解釋個體間實際互動的行爲。此外，管理學者從「相似吸引典範」（similarity/attraction）的觀點，以及社會學者從同質性（homogeneity）（Feld, 1982；McPherson and Smith-Lovin, 1987）的觀點，認爲人際間會因爲彼此相似，而相互吸引，同類型的人容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或者是在社會上，社經地位相當的人（例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階級等），容易在居住、工作、社交、休閒或社團等活動或場合建立聯繫，這些社會結構上所造成的互動機會，成爲同質性影響人們交往的重要前提。在經驗研究的操作上，人口統計變項、態度、價值觀及認知的相似性，容易提升人際間彼此的吸引與喜歡，並建立起穩定的聯繫關係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Tsui and O’Reilly, 1989）。據此，行動者背景的相似性或同質性，可以在對偶關係的討論中，作爲相互吸引的主要來源（Brass, 1995；Williams and O’Reilly, 1998）。綜上，這裡可以提出一個跟同異質性有關的研究假設：在分析對偶關係中，彼此間背景變相的相似性（同質性）[2] 愈高，彼此間在 4 個社會關係網絡的距離就會愈短。

都市政策網絡除了可以從總體的層次進行對立團體的影響力分析，也可以從事社會網絡的對偶關係層次之分析。每個行動者在特殊政策場域（policy domain）（Laumann and Knkoe, 1987）內的重要議題上，都會表現其興趣所在及其可動員的資源來影響政策的結果，這些行動者的行動是附著於溝通討論及資源交換網絡（Granovetter, 1985；Marsden and Laumann, 1977）之中。特殊化的溝通及資源交換可使行動者藉此社會互動過程獲取有價值的訊息及資源，並對其有興趣的特殊事件進行參與和影響。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觀之，二者間溝通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彼此可確認的用語和遊戲規則，讓彼此的行爲能符合對方的預期，展現的是一種網絡管理（network management）（Kickert et al., 1997）的思維。在 Laumann 與 Knoke (1987) 的研究中，發現能利益共享的行動者，對都市事件的立場與觀點類似，或是兩者均屬同一類型的組織，則行動者兩者之間的溝通距離相對也較近。因此，這些行動者間兩兩關係形成的原則爲何，哪些因素和兩兩溝通關係形成有關，成爲本論文主要關懷的問題和分析重點。

總的來說，這種用事件參與的行動網絡與日常生活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關係來審視都市權力運作的慣性結構及其支配力，可以讓我們反省派系、部門等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範限制力，對都市事件網絡關係形成的影響力，也有助於將都市發展政策中政治菁英間的權力關係精緻化。一個政治菁英的背景與制度性的位置，可能會對其在網絡中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與

[2] 在理論的用語上，管理學者喜用相似性（similarity）的概念表述在人口統計變項的一致性，而社會學者比較傾向使用同質性（homogeneity）來表達類似的分析概念（Laumann, 1973；Fischer, 1982；Marsden, 1987；Burt, 1992；熊瑞梅，1994；傅仰止，1999），特別是社會網絡學者使用同質性此一概念，常常用來指涉網絡參與者的背景特質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一致性很高，表示網絡的結構非常的單元化，或是表達具有相同特徵的行動者比較具有建立關係的機會。因為意義相似，本研究並沒有嚴格的區分或統一兩種不同的用語，會在寫作中有混用的情形。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位置而有所影響，並進而影響了決策的結果，這樣的思考邏輯非但符合前述相似吸引典範的觀點，也符合華人社會中「關係」的「現實性」（Pye, 1995；Yang, 2002；Lo and Otis, 2003），從功利性的角度觀之，對關係的投資是建立在可預期的報酬上，特別是有助於其行動意義的信任網絡關係（Lin, 2001）。換言之，若對方沒有什麼可以跟我交換的資源或拉近交往的特質，我爲什麼要跟對方維持關係？自然就不可能發生與維持影響決策的穩定結構。據此，除了測量都市政治菁英在處理都市發展政策議題的網絡結構之外，本文也會從制度性（政黨同異、派系、政府部門與議會背景）與個人特質（教育、年齡與聲望）等角度，提出可能會影響這些政治菁英如何經營關係的因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邊界與樣本的設定與選取

過去從事社區菁英的研究，在選取社會網絡的成員時，必須有效地設定社會網絡的界線，而政策網絡研究最大的挑戰之一，也是在於如何設定網絡的邊界範圍，對於網絡邊界的設定將決定研究的效度（Wasserman and Faust, 1994；Knoke and Yang, 2008）。政策場域是一種 Luamann 與 Knoke (1987) 發展用來界定菁英範圍的策略，政策場域的行動者及事件之選取將決定社會網絡成員的多寡與網絡結構的大小。完整的政策場域行動者包括對都市事件或議題有興趣與影響力之行動者，這些行動者一般包括直接管轄都市發展的相關政府部門官員和民意代表，及都市中的土地開發與建商等私有部門的組織，及關懷空間發展的環保組織、地方居民代表或營建公會等非營利組織（Laumann and Pappi, l976）。Laumann and Knoke (l987) 提出政策場域界限界定之策略，亦即事件參與法，這個指認行動者方法的思考邏輯是認爲只要是利益相關的政策事件，有興趣的政治菁英都會透過對事件的參與來展現其對政策的影響力。因此，此法乃先找出對台中都市發展有影響力之重大事件，再由這些事件確認參與事件之行動者。

由於本研究的個案是地方都市爭議事件的決策影響力結構，從制度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層面來說，這個政策影響力涉及兩個層次的決策模式：中央與地方。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大部分是以組織法人的利益與互動形式爲主，是基於正式制度上府際間的法律互動關係；但地方都市爭議或重大事件，仍以地方菁英個人利益與社會關係運作爲主的社會影響力機制。從行動者的界定來說，本研究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諮商網絡以及資源交換網絡等四個社會網絡的網絡資料是以兩種形態資料出現，其中政府部門、學術單位、非營利組織、與建商私部門是以組織的代理人爲行動者，但民意代表與土地爭議事件地主則以個人行動者資料出現。

根據上述的思考邏輯，本研究首先整理台中市從 1986 年到 1992 年左右重要的都市發展事件，選取事件的判準主要以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以及比較具有完整結果的事件爲主。並且從 4 個較直接跟台中市都市發展有關的政策場域中尋找相關事件，此 4 個政策場域爲：公共服務、地方財政、技術（主要以道路修護與建設爲主）、一般公共設施建設方案。資料來源從台中市文化中心文獻室的各大報剪報資料抄錄，一共找出了 73 個重要事件。在 73 個事件中，每一個出現的行動者（包括組織與個別行動者），均再標出其所屬組織名稱，由此共找出 148 個行動者。若無具體的組織名稱可供編碼，便依其背景特質給予理念上的組織類別，例如：社區居民或土地業主。

初步根據行動者的部門分類統計都市事件參與的頻率，出現最多的組織爲市議會，共有 37 次；其次爲市政府各單位爲 34 次，第三爲中央及省政府組織，共出現 25 次，社區居民及土地業主有 22 次，建商、土地開發等資源開發組織有 7 次，草根運動團體也只有 7 次，其餘組織，如仲介公司、商業及服務業、專業組織、商會、公共利益團體、教育研究機關、省議會、軍方、公營事業、政黨等組織類型個別僅出現 0～4 次。

再者，如何在 73 個事件與 148 位行動者選取都市發展議題的事件與行動者？首先作者分別請台中市政府主任秘書與都市計畫科長及資深中部地區某大報記者，在 73 個事件中圈選最重要的 12 個事件與參與事件重要行動者，本研究也參考了前面的行動者參與事件的次數，參與次數較多者又與重要都市事件有關者都優先考量。根據初期作者參與田野調查與受訪者曾提供的訊息，以及爲了防止在都市發展體系中，具有重要角色者遺漏在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蒐集的範圍之外，本研究又根據立意抽樣的思考邏輯，再加入部份在都市發展政策中的重要決策部門具有影響力的決策菁英。這些參與的行動者當中較重要的有：省住都局長、歷任台中市都市計畫課長、建設公司財團董事長、歷任台中市政府財政局長、都市計畫委員、省議員、市議員、中華工程顧問公司、台灣土地投資開發公司、市政府都市計畫課、內政部都委會、省都委會、省地政處重要成員等。

本研究對解嚴前後的都市空間利益衝突所造成的衝突對立結構有興趣，參考前面各種資料與方式，選取了 12 個較具爭議且又對台中市都市發展有大影響的事件，並企圖針對此 12 事件做較爲細緻的分析。但經過試訪後，發現一個受訪者要同時談 12 個事件耗時過多，每次時間均超過兩小時以上，故又進一步按照事件的重要性與衝突程度進行議題篩選，將事件減少成八個。同時，試訪的過程中也從受訪者的建議增加了一些相關的行動者新名單，最後正式訪問的問卷共有事件 8 個，[3] 行動者 112 位。[4] 換言之，本研究以此參與此八事件的 112 位行動者作爲分析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菁英網絡的邊界範圍。

二、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過程

在問卷的設計上，本研究主要依照 Laumann 與 Knoke (1987) 在《組織國》（*The Organizational State*）一書中的問卷設計爲藍本，其透過以集體行動體系理論爲分析架構，研究美國 1970～1980 年代的能源與醫療政策的組織行動者參與決策的社會過程與政策網絡的權力結構。本研究也依其架構，將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的問卷設計區隔爲都市發展價值觀、政策議題與立場、網絡溝通、組織特質與個人基本資料四個部分，前面三個部分的題組分別代表了《組織國》的研究中重要的概念與測量變數：首先、在都

3 意指透過上述的步驟，本研究以這八個事件與 112 位行動者所構築成的關係結構，作為測量台中市在 1990 年代左右的都市發展政策網絡。此 8 個事件分別是：綠川加蓋、中心商業區實施單行道、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的回饋計畫、放寬第八期豐樂里細部計畫容積率管制、第十期重劃區附近的行水區納入重劃範圍、市政府主張第十一期重劃採公辦方式、在台中市西屯區設立科技園區、綠 18 變更案，詳細背景請參閱附錄一。

4 112 位台中市地方政治菁英受訪名單請詳見附錄二。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市價值觀的部分，在問卷設計上要求受訪者針對台中市都市發展 12 個重要的議題圈選其對每項議題的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分成五等級，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再者、在政策議題與立場的部分，針對受訪者對都市事件的興趣、參與情形、角色與立場進行名目尺度的題項設計，以上的題項並沒有在本研究當中被用來進行分析與討論；第三、在網絡溝通的部分，主要是以提名法社會網絡問卷的方式，進行對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諮商網絡，以及資源交換網絡的資料蒐集，並且進一步在此部分蒐集政策菁英影響力聲望（influence reputation）的資料。

在社會網絡相關題項的概念化與操作化，前述論及是參考了政策網絡研究（Laumann and Knoke, 1987；Knoke and Pappi, 1991；Knoke et al., 1996）與組織行爲學者（Krackhardt, 1992）的研究，也吸取了研究社區菁英如何解決社區公共事務的研究經驗（Laumann and Pappi, 1976；Laumann et al., 1977；Galaskiewicz, 1979；Laumann and Mansdan, 1982），在此不再贅述，相關的衡量題項在附錄 3 可供參考，4 個社會網絡的題項在本研究是用以測量台中市都市菁英在參與都市發展事件時的關係結構，並將受訪者於 4 種關係的有、無作爲分析的依變項。爲了測量受訪者在社會網絡的關係型態，本研究請受訪者在所列的 112 位地方政治菁英的名單中，選取在都市事務討論、信任關係、技術諮商與資源交換關係上，會向名單中的哪位行動者尋求支持，有關係則過錄爲 1，沒有關係則過錄爲 0。爲了讓受訪者能輕易理解 4 個社會網絡關係的差異，作者在設計相關題項時，盡量使用一般民眾較容易意會的用語，並與台中市都市發展的相關事件能夠緊密結合，讓受訪者能夠是在都市事件的脈絡下去挑選自己與其他政治菁英間的關係爲何。

除了 4 個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之外，本研究還透過受訪者評價所有列名的菁英，測量其主觀上認爲這些政策菁英誰在政策的事件上具有影響力，也就是後續分析上所稱的聲望，被認定爲有影響力者過錄爲 1，沒有影響力則過錄爲 0，將所有受訪者對某一政策菁英的評價分數累加，即是該名政策菁英的影響力聲望分數；最後，在組織特質的部分，則與個人背景資料一樣，在蒐集政策菁英本身所代表的組織特質的資料。研究問卷的節錄請參閱附錄 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樣本人口統計變項分析表

項　　目	類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76	97.4
	女	2	2.6
教　　育	小學畢業以下	2	2.6
	初中	3	3.8
	高中	22	28.2
	大學	36	46.2
	研究所以上	14	17.9
	遺漏	1	1.3
政　　黨	國民黨	62	79.5
	民進黨	5	6.4
	其他（無政黨背景）	11	14.1
部　　門	政府組織	30	38.5
	市議會	18	23.1
	教育研究機構	12	15.4
	資源開發	7	9.0
	仲介活動	3	3.8
	商業及服務業	3	3.8
	專業組織	5	6.4
年　　齡	小於 30 歲	9	11.5
	31～39 歲	22	28.2
	40～49 歲	30	38.5
	50～59 歲	14	17.9
	遺漏	3	3.8
派　　系	張派	16	20.5
	賴派	16	20.5
	其他（全都爲無派系）	46	59.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台灣的社會，訪問政治菁英的困難度很高，若缺少社會關係的介紹，較難贏得受訪者的信任，不會輕易接受訪問，因此在施測前，與受訪者建立聯繫關係是必要且耗時的工作。本研究是從 1994 年 8 月開始，從問卷的設計、事件與行動者的選取，及前測、大約花了 3 個月左右。前測目的最主要在增進本研究的外部效度，以針對問卷中題意不清的部分再進行補充與修正。正式訪問是從 1994 年 11 月到 1995 年 8 月完全結束，由作者與 3 位博碩士兼任助理一同完成。爲了避免受訪者在受訪的過程中無法清楚理解四個社會網絡關係的差異，訪員面訪時會進行說明與提醒。除了問卷的測量之外，本研究也在訪談的過程中透過開放式的問題蒐集相關的質化訪談資料，主要的訪問大致在 1995 年 3 月就結束，並開始過錄（coding）初步的資料。總的來說，最後有效樣本是 84 位菁英，然因本研究的焦點是放在地方權力結構的分析，且最後訪問的 6 位分別是中央、省官員及中央民代，人數有限，在分析上不足以表現垂直關係，故將中央與地方垂直關係的部分拿掉，暫時不納入分析，最後納入網絡分析的行動者有 78 位，其樣本人口的統計變項分佈可整理如表 1 所示。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資料分析上，2 個都市政治菁英在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技術諮商關係網絡以及資源交換網絡間互動的親疏遠近爲依變項，其他相關的背景變項爲自變項。這些背景變項包含了：都市菁英對於都市事件的立場、教育程度、年齡、黨派背景、隸屬部門、派系背景。進行分析的時候，本研究會先將社會網絡的資料轉換成最短距離矩陣，然後再計算出對偶關係的最短距離。這裡指涉的距離是操作型定義，社會網絡分析可以將行動者間的關係資料轉換成 1 個兩維或三維空間上的距離與分佈，距離的概念跟網絡分析中捷徑（geodesics）的關連性很大，捷徑意指兩個點間最短的路徑，而距離的意思是 A 節點走到 B 節點的路徑至少要經過幾條捷徑的總數。換言之，對偶間的距離意指兩個菁英間在某種溝通與交往關係上的親疏遠近與互動頻率，距離愈近者，表示互動的頻率愈高，關係愈緊密。從政策網絡的假定來說，互動愈緊密且愈頻繁的行動者間愈有可能形成所謂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Rhodes and Marsh, 1992），共享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穩定的互動文化與權利義務關係，對成員彼此間的行爲較有可預測性，政策社群對政策產出的影響結果也比鬆散的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Rhodes and Marsh, 1992）大。據此，如果在一個網絡中存在 n 個節點，對稱性的網絡就有 n(n-1)/2 個對偶關係，倘若是非對稱網絡，2 個行動者間就會因爲關係的不對稱產生 2 種不同方向的關係型態，因此非對稱網絡的對偶關係是 n/(n-1) 個。本研究有 78 個都市菁英，在原始資料上就是 4 個 78×78 的關係矩陣，扣除掉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每一個矩陣的資料都可以計算出 6,606 種對偶關係的最短距離。這種研究對偶關係的分析操作方式，最主要是從 Laumann and Pappi (1976) 在研究社區菁英關係的研究發展出來，其將整體網絡的資料轉成行動者間對偶關係資料，且用對偶關係的距離，或用兩者與他人關係的相似性來測量影響對偶關係的因素。後續相關研究的方法也被應用在政策網絡的研究（Laumann and Knoke, 1987）。

在進行相關分析時，自變項也被轉換成社會距離矩陣的形式進行分析，以進行不同變項社會距離相似性（同質性）與相異性（異質性）關係的檢驗，進一步瞭解是否在背景上具有相似性或同質性的都市菁英，在 4 個社會網絡中彼此間的社會距離也愈近。其中都市事件距離意指行動者間在 8 個都市事件當中立場的相似性，距離愈近則意指立場愈相近；聲望（請託者）意指在對偶關係中，屬於請託者（關係發送者）其影響力聲望的高低，聲望（受託者）則意指對偶關係間若屬受託者（關係接收者）聲望的高低；政府（請託者）則係指對偶關係中的請託者（關係發送者）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身份的政治菁英，同理，政府（受託者）則指涉受託者有政府部門背景的身份。在進行交叉列聯分析與邏輯迴歸分析的時候，原本的自變項要進一步轉換成組別的形式重新過錄。比如說：年齡的分組是直接從受訪者所提供的年齡原始資料去做加減而得，區分爲大於五歲正負五歲之內；而教育背景的部分，則是要從選項的差距上去判斷。比如說：受訪者 A 的教育程度爲初中，受訪者 B 的教育程度爲大學，則在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B 的對偶關係中，A 與 B 的教育程度是被歸類在 A 比 B 低 3 年以上的類別，其他處理方式則以此類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社會網絡對偶關係的分析

本節的分析主要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將政治菁英間 4 種關係網絡中所呈現對偶關係間的最短距離，與一些可能的相關因素作線性相關分析，以初步探討之；第二部分，爲了避免對偶間的最短距離涉及到空間各點隨機配置方式因素的影響，又嘗試將對偶關係視爲有無來處理，許多在相關分析中使用的自變項，也嘗試透過類型分析法，先用交叉分析，再用邏輯迴歸分析處理之，討論的是非線性的關係。

一、行動者間對偶關係最短距離的相關因素

在此第一部份分析結果相關性的正負號，顯示了兩個變項之間關係的方向，每一個變項指涉的都是兩者間關係最短社會距離的長度，若正號表示行動者間變項一的社會距離愈短（相似性高），另外一個變項的社會距離也愈短；負號則是變項一的社會距離愈短，則變項二的社會距離就愈長（相異性高）。再者，爲了判別相關性的強弱，本文引用 Portney 與 Watkins (2000)的標準：相關係數 .00～.25 表示沒有或輕微相關；.25～.50 表示低度相關(fair degree)；.50～.75 表示中度相關(moderate to good relationship)；.75 以上表示有很強的相關（ good to excellent relationship ）。

表 2 呈現與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兩者間最短距離的相關因素，相關係數平均來說並不高，大多處於低度相關（r<.5），但大多達到 .001 以上的顯著水準，最顯著的相關因素是網絡中兩者信任關係的最短距離（r=.569）。此外菁英間兩兩的技術諮商關係（r=.385）或資源交換關係的社會距離（r=.330）愈短，則兩者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社會距離也同樣越短，這顯示了這四個網絡間彼此有正向的關係。其次，若兩者中主動找對方討論者的聲望越高，則此二者都市事務討論關係也愈近（r=–.101）；同理，若兩者中的請託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政府部門者，兩者間討論關係的社會距離較短（r=–.075）。受託者的聲望和官方部門身份與兩者討論相關不如請託者聲望高的效果大。都市菁英間年齡、政黨和部門的相似性越大，兩者間有愈近的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然而，兩者間相同派系背景反而有較遠的都市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務討論關係（r=.040），跨派系間的菁英討論關係反而較近。行動者兩者間對八個都市事件的贊成反對（立場）模式相似性和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社會距離也有輕微關連性（r=.035），而菁英間教育的相似性和兩者間都市討論關係距離沒有相關。

表 2　事務討論、信任、技術、資源交換關係距離與相關變相的相關係數

	事務討論	信任關係	技術諮商	資源交換
事務討論	1.000	.569***	.385***	.330***
信任關係	.569***	1.000	.239***	.458***
技術諮商	.385***	.239***	1.000	.252***
資源交換	.330***	.458***	.252***	1.000
都市事件距離	.035**	.011	.016	.061***
年齡相似性	–.093***	–.155***	–.003	–.074***
教育相似性	.017	–.028*	.132***	.130***
政黨相似性	–.037***	–.112***	–.096***	–.160***
部門相似性	–.050***	–.028*	–.053***	–.078***
派系相似性	.040**	.090***	.026*	.099***
政府（請託）	–.075***	–.049***	–.151***	–.118***
政府（受託）	–.035***	–.057***	–.029*	–.012
聲望（請託）	–.101***	–.103***	–.053***	–.116***
聲望（受託）	–.053***	–.052***	–.060***	–.06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001、**<.01、*<.05

信任關係網絡的二者間最短距離和大部分的自變項間有顯著的關係（都市事件立場距離除外）。從顯著的相關係數來看，和行動者兩者間信任關係社會距離相關最大的變項是事務討論關係距離（r=.569），其次是社會資源交換關係社會距離（r=.458）；技術諮商的關係社會距離與信任關係距離相關較低（r=.239）。若政治菁英兩者關係中，無論是作爲請託者（r=–.103）或受託者（r=–.052），只要其影響力聲望越高，則信任網絡關係距離也越短。此外，同樣的現象也反映在若政治菁英兩者中的請託者（r=–.049）與受託者（r=–.057）爲具有官方權威的政府部門，兩者的信任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社會距離較短。菁英間年齡、政黨、部門、和教育的相似性越大，則菁英間信任關係距離較短。反之，同派系的網絡成員，在信任關係網絡的距離相對較遠（r=.90）；菁英間對 8 件都市事件看法距離的相似性，與菁英間信任關係距離沒有顯著相關，這顯示了台中市政治菁英間信任關係的遠近有跨派系的特質，且與都市事件或公共事務觀點一致性無關。

技術諮商網絡二者間最短距離仍然和大部分的自變項有顯著關係（都市事件距離與年齡相似性除外）。和技術諮商對偶關係距離相關性最高的因素是都市事務討論對偶關係距離（r=.385），與私下的信任對偶關係的距離（r=.239）和資源關係距離（r=.252）的相關性較弱。從行動者本身的聲望看來，任一方聲望越高，則兩者間技術諮商關係的距離越短（請託者：r=–.053；受託者：r=–.060），請託者的身份若有政府部門背景（r=–.151），則技術諮商關係距離較短。行動者間教育程度異質性較大者，其技術諮商網絡距離較短（r=.132），此意謂著菁英間呈現教育程度較低的請託者，向教育程度高的受託者請教有關都市發展專業知識的諮商網絡關係，例如：台中市市長請教都市專業技術的教授或將聘其爲都市計畫委員的專業職務（王光旭，2005b）。此外，地方政治菁英間相同政黨（r=–.096）或部門（r=–.053）者，其技術諮商關係的距離較短。同樣地，不同派系的菁英間反而有較短的技術諮商距離（r=.026）。有趣的是菁英間年齡的相似性和菁英間技術諮商關係距離無關，行動者對 8 個都市事件贊成與反對態度的一致性與 2 個行動者間的技術諮商關係距離也無關。顯然，技術諮商的關係距離相近性和菁英間的都市事務的專業知識需求和正式互動關係有關。

資源交換關係的分析呈現了與前述關係類似的結果，大部分自變項與依變項資源交換關係的最短距離有顯著的關係（具官方背景的受託者除外）。從顯著的相關係數來看，2 個政治菁英間的資源交換關係距離和信任關係距離的相關性最高（r=.458），其次和都市事務討論網絡關係距離相近（r=.330），關係最弱的則是技術諮商網絡的關係距離（r=.252）。

2 位政治菁英中若請託者是政府部門者（r=–.118），或聲望越高者（r=–.116），則資源交換網絡對偶關係的距離便越短。菁英間政黨、部門、和年齡間愈具相似性，在資源交換網絡中的關係距離也較短；但教育程度相異的兩者，在社會資源交換網絡中的距離也較短（r=.130），此意謂著多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異質菁英間，比較容易產生互補的資源交換網絡關係。再者，雖然菁英對八個都市事件的態度相似性僅有非常弱的顯著相關（r=.061），但結果呈現的是地方政治菁英間對 8 個都市事件的看法越相似，其社會資源網絡成員間的關係距離也越短。

綜合這 4 個網絡二者關係最短距離相關因素的分析結果，大致可呈現幾個網絡中二者互動的原理意涵：(1) 都市菁英間的信任網絡兩者間最短距離和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及資源交換網絡兩者最短距離的相關較高，可見這些都市菁英間正式網絡（都市事務討論）和非正式網絡（信任和資源動員）具有相互影響的特質，且這些相關遠超過二者間制度位置身份和特質的同／異質性的影響。(2) 菁英在 8 個都市事件的看法相似性越高，其在都市事務討論與資源交換網絡的兩者間最短距離越短，顯然，這些都市政治菁英對都市事件的意見愈一致，與彼此間的資訊與資源交換關係有正向的關連性（Knoke and Yang, 2008；熊瑞梅，1995a；1995b），這可能與解嚴後台灣地方社會菁英的利益與立場的穩定，和理性制度化法則的實施有明顯的關連性。(3) 菁英兩者在各種社會結構特質位置上的同質性，和 4 種社會網絡關係類型的菁英間最短距離都是顯著關係。菁英間政黨與部門的同質性有助於各類型社會網絡關係的短距離溝通，但菁英間僅有教育同質性有助於信任關係距離的縮短。年齡的相似性也有助於菁英間都市事務討論、信任和資源交換關係距離的縮短。(4) 菁英間的權威和聲望影響力法則：菁英的請託者具有政府部門正式權威身份或具有較高的聲望，其在 4 種社會網絡上的二者關係距離較短。Laumann 與 Knoke (1987) 的研究說明美國醫療和能源政策討論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的權力集中化高，政府部門的菁英在政策討論網絡上的二者關係距離相對較大；反之，台灣在地方都市的社會關係頻繁，網絡中有聲望與具備政府身份的菁英有助於大部分的社會網絡溝通（除了技術諮商網絡），也與其他行動者間的社會距離較近，是一種較地方化與分權化的討論網絡結構特質。有趣的是受託者若是政府，資源動員網絡二者關係距離較遠，可見，政府部門的菁英，在都市發展政策的參與中比較難被影響與動員。(5)異質化的跨界溝通：不同派系菁英間的 4 種社會網絡關係距離都較短；此外，不同教育程度的菁英間比較有較短的技術諮商和資源交換關係距離。不同團體間的社會網絡關係連結，可促使整個台中都市政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策各種類型社會網絡的有效快速連結。這些發現均指涉了討論地方派系的資源或利益交換，不能再用同質化或是侍從主義式的效忠邏輯來解釋台中地方派系與都市發展政策。

二、對偶關係聯繫與否的關連因素

Laumann and Pappi (1976) 在過去的研究中，常將整體網絡的資料轉成行動者間對偶關係資料，且用對偶關係的距離，或用兩者與他人關係的相似性來測量影響對偶關係的因素。Krackhadt (1988) 指出一個整體網絡中任何兩個點的資料在空間可以隨機擺設，但因爲空間位置的地點不一，會使得最短距離的算法有許多可能性。

爲了避免距離因空間位置的擺設造成的多種估計值的現象，本研究更進一步採用 4 個網絡中兩個行動者間有無關係爲依變項，將 78 位菁英 6,006 組對偶關係，進行交叉列聯分析與邏輯迴歸分析。對偶關係存在的數量很大，所反映出來的信息會遠比個人背景變項的分類豐富，比如說：在個人變項分類中的政黨背景，原本僅有國民黨、民進黨與其他，然計算出對偶關係的數量之後，對偶關係除了同樣是國民黨的 2 個行動者、同樣是民進黨的 2 個行動者，同樣屬於其他的 2 個行動者的關係所組成之外，還有分屬不同政黨背景的兩個行動者所組成的對偶關係，故在分類上，會比原本個人背景分類多出不同政黨一個類別。同理可證，在以部門及派系爲背景的分類當中，分屬不同部門或不同派系背景的行動者所形成的對偶關係，遠比相同部門與相同派系或其他背景的行動者多。

其實許多行動者間部門與政黨的同異質性，會因同一類屬的特徵，導致某些關係產生的機率有所不同，例如在台中市同是張派或同是賴派，或同是國民黨或同是民進黨的背景，其各種網絡關係聯繫型態與機率就可能皆不相同，用交叉列聯分析比用線性相關更可呈現這種訊息。此一分析也可以驗證前述所提「相似吸引典範」（similarity/attraction）的觀點，檢證人際間是否會因爲彼此背景相似，而有較爲親近的溝通與行動關係。

如表 3 所示、年齡差距較小的組群（正負 5 歲內），在都市事務討論、信任關係、技術諮商、與資源交換等社會網絡的聯繫頻率，均較年齡差距較大的群組（大於 5 歲以上）爲高，顯著水準均小於 .001。一般而言政治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菁英間出現最頻繁的網絡關係類型是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對年齡差距在正負五歲內的菁英而言，有 23.5% 的都市事務討論關係聯繫形成，但大於五歲以上的行動者，僅有 17.6% 的討論關係形成，可見在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中，年齡較爲相近的行動者，在都市事務參與溝通討論的關係上也較爲親近與密切，與同質性的理論預期契合。技術諮商網絡（6.6%）與資源交換網絡（7.8%）的聯繫關係的頻率較低，從質化訪談的資料檢視，前者是因爲僅有少數行動者擁有技術諮商的能力與知識，後者則是社會資源的交換與動員也是鑲嵌在社會網絡中，僅有少數的菁英擁有可以進行交換不對稱的資源與互動關係。比如說：選舉時提供資金的行動者與做爲椿腳的行動者雖然具有資源交換的關係，但其角色與互動是不對稱的。

政治菁英的教育差距對彼此在都市事務討論的聯繫和信任關係都有影響，請託者若教育程度較受託者教育程度低於 3 年以上，則兩行動者間形成都市事務討論網絡關係的機率較大（22.8%）；反之，請託者若教育程度較受託者高出 3 年以上，則彼此建立聯繫的機率相較而言就低了很多（16.1%）。同樣的在信任關係的網絡之中，教育程度低與教育程度高的請託者和受託者之間，也有像前述事務網絡一樣的關係類型。此數據分佈意味著台中地方政治中，教育程度較低的政治菁英，建立資訊網絡和信任網絡的機會與教育程度較高的行動者有統計上差異性。台中市的政治菁英間都市事務討論關係與信任關係的聯繫不是分佈在教育程度相近的行動者間，相反的，反而是教育程度相異的行動者更容易建立起聯繫關係，這種狀況很合乎 Granovetter (1973) 的弱聯繫（weak tie）假設以及 Lin (1982) 社會資源假設，而不是像有互動聯繫政治菁英年齡的分佈呈現了較爲同質化的結構。

前面有關政治菁英間各種類型關係最短距離的相關分析中，同政黨的各種社會網絡關係距離較短，透過 4 種網絡關係類屬列聯分析，可以看出具國民黨背景政治菁英間的聯繫較頻繁，尤其在都市事務討論的網絡關係中，同屬國民黨便有 25.5% 的關係形成。相對而言，民進黨、其他政黨或無黨籍者，彼此間的聯繫頻率就不若國民黨員高。可見國民黨的地方政治菁英在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中來往頻繁，特別是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其所奠定的社會關係基礎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行動力量。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行動者二者特質差異與 4 種類型的社會網絡對偶關係之有無

二者特質差距	事務討論		信任關係		技術諮商		資源交換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年齡差距								
>5 歲	1570 (82.4)	335 (17.6)	1791 (94.0)	114 (6.0)	1827 (95.9)	78 (4.1)	1839 (96.5)	66 (3.5)
正負 5 歲內	2788 (76.5)	857 (23.5)	3272 (89.8)	373 (10.2)	3403 (93.4)	242 (6.6)	3362 (92.2)	283 (7.8)
chi-square=	26.70***		29.90***		15.73***		43.09***	
教育差距								
>3 年	1307 (83.9)	25 (16.1)	1475 (94.7)	82 (5.3)	1479 (95.0)	78 (5.0)	1460 (93.8)	97 (6.2)
正負 3 年內	1255 (80.6)	302 (19.4)	1424 (91.5)	133 (8.5)	1477 (94.9)	80 (5.1)	1474 (94.7)	83 (5.3)
<3 年	2232 (77.2)	660 (22.8)	2607 (90.1)	285 (9.9)	2722 (94.1)	170 (5.9)	2715 (93.9)	177 (6.1)
chi-square=	29.56***		30.23***		1.90*		1.47*	
政黨同異								
不同政黨	1857 (88.7)	237 (11.3)	1972 (94.2)	122 (5.8)	2000 (95.2)	94 (4.5)	2010 (96.0)	84 (4.0)
同是國民黨	2819 (74.5)	963 (25.5)	3414 (90.3)	368 (9.7)	3557 (94.1)	225 (5.9)	3514 (92.9)	268 (7.1)
同是民進黨	18 (90.0)	2 (10.0)	19 (95.0)	1 (5.0)	20 (100.0)	0 (0.0)	19 (95.0)	1 (5.0)
其他	100 (90.9)	10 (9.1)	101 (91.8)	9 (8.2)	101 (91.8)	9 (8.2)	106 (96.4)	4 (3.6)
chi-square=	190.27***		27.21***		9.39*		25.28***	
部門同異								
不同部門	3891 (84.1)	733 (15.9)	4325 (93.5)	299 (6.5)	4436 (95.9)	188 (4.1)	4397 (95.1)	227 (4.9)
同是政府	514 (59.1)	356 (40.9)	730 (83.9)	140 (16.1)	758 (94.1)	112 (5.9)	785 (90.2)	85 (9.8)
同是議會	210 (68.6)	96 (31.4)	266 (86.9)	40 (13.1)	287 (93.8)	19 (6.2)	285 (93.1)	21 (6.9)
其他	179 (86.9)	27 (13.1)	185 (89.8)	21 (10.2)	197 (95.6)	9 (4.4)	182 (88.3)	24 (11.7)
chi-square=	279.41***		86.51***		88.18***		38.63***	
派系同異								
不同派系	2799 (81.0)	657 (19.0)	3157 (91.3)	299 (8.7)	3294 (95.3)	162 (4.7)	3269 (94.6)	187 (5.4)
同是張派	157 (65.4)	83 (34.6)	206 (85.8)	34 (14.2)	232 (96.7)	8 (3.3)	225 (93.8)	15 (6.3)
同是賴派	195 (81.3)	45 (18.8)	204 (85.0)	36 (15.0)	224 (93.3)	16 (6.7)	190 (79.2)	50 (20.8)
其他	1643 (79.4)	27 (20.6)	1939 (93.7)	131 (6.3)	1928 (93.1)	142 (6.9)	1965 (94.9)	105 (5.1)
chi-square=	30.48***		32.76***		14.54**		64.7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001、**<.01、*<.05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台中都市發展事件的政策網絡中，政治菁英主要的部門背景有市政府的行政系統與議會系統，其他小部份的政治菁英則分別是專家學者，土地利益有關的商人，與非營利組織負責人等這些背景的行動者，由於其他類的行動者次數較少，模式類似，故被合併成一欄其他。從表 3 中，很明顯的可看出在都市事件發展政策網絡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政府行政部門與議會系統，其中政府部門的重要性又大於議會，同是政府部門的菁英在 4 種社會網絡聯繫出現的頻率，幾乎都大於相同議會的議員彼此間的聯繫（僅有技術諮商網絡稍低於議會部門），此也意味著具有市政府背景的都市菁英，在都市發展事件的相關網絡上，較能掌握相對較優勢的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都市發展網絡也有部門同質化的現象。

至於同派系的政治菁英在各種社會網絡聯繫的建立上也出現有趣的現象。首先、同是張派的政治菁英，其都市事務討論聯繫關係形成的機率遠大於其他的關係型態，有 34.6%；但同是賴派的政治菁英，彼此之間形成資源交換聯繫關係的頻率又遠高於張派（20.8%）。這可能顯示了同是張派的政治菁英在 8 個都市事件中的政策網絡，相對地較勤於蒐集資訊，也或許代表在都市事務討論上較爲積極熱心，本研究進行訪問時的台中市議會議長正是張派的政治菁英。但論及信任關係，技術諮商、與資源動員交換網絡三者，同是賴派的政治菁英間互動反而比張派頻繁，特別是從派系間社會關係網絡密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賴派成員在資源動員網絡密度上是張派成員密度的 3.5 倍（.21/.06），這也反映出當時賴派的政治菁英在 1990 年左右時在台中市都市發展的互動較爲頻繁。從地理的分佈來看，賴派的政治菁英多半是集中於都市後期開發的重劃區，而張派則是集中在台中市都市核心的老市區，也可能導致了派系間與內部互動關係的差異，賴派政治菁英資源交換的頻繁可能與當時積極投入屯區的土地重劃有關。這種現象也驗證了熊瑞梅與邱瑜瑾（1995）的論文所提出的觀點：賴派政治菁英社會組織資源與社交圈的豐富性。

三、對偶關係聯繫與否的決定因素

上述的交叉分析是在沒有控制其他變項的狀況下，來呈現對偶關係會產生的比例高低，若將這些與 4 種行動者間的社會網絡對偶關係有相關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變項放在邏輯迴歸的解釋模型中，政治菁英間的年齡、教育、政黨、部門、與派系的同異質性，是否仍對有或沒有社會網絡關係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在此模型獨立變項的處理方式如下：每個獨立變項中都是以 2 個政治菁英特質不同爲對照組，在年齡的差距上是以兩者差距 5 歲以內對照差距 5 歲以上的行動者；在教育程度的差距上是以請託者低於受託者 3 年以下的教育程度，以及請託者和受託者的教育程度差距 3 年之內，來對照請託者教育程度大於受託者 3 年以上的政治菁英；在政黨的同異上，以同是國民黨、同是民進黨、或同是其他政黨或無黨派的政治菁英，來對照不同政黨背景菁英間的聯繫關係；在部門同異上，以同是政府部門、同是議會部門、與同是其他部門，對照兩者間是不同部門背景的政治菁英；在派系同異上，同是張派、同是賴派、或同屬完全沒有派系背景，對照兩者背景屬於不同派系的政治菁英。

表 4 顯示了兩者間的年齡差距、教育差距、政黨同異、部門同異、派系同異等變項，能解釋都市事務討論網絡中，政治菁英間是否存在對偶關係。顯然，在控制了其他變項，前述交叉分析中有意義的變項，仍有其獨立的影響力。政治菁英間的年齡差在正負 5 歲內，顯著的比兩者年齡差超過 5 歲的政治菁英，有較高的機率建立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兩者差距 5 歲內的勝算比是兩者差距 5 歲以上的 1.679 倍，亦即年齡同質相近的政治菁英間，建立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機率，是年齡異質團體建立都市事務討論關係機率的 1.679 倍。再者、從政治菁英間的教育程度觀之，請託者比受託者教育程度低於 3 年以上（1.474 倍），和請託者與受託者的教育程度在 3 年以內（1.416 倍），都比請託者高於受託者教育程度 3 年以上的行動者有更高的機率建立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可見教育程度類似或教育程度低的政治菁英，請教高教育程度政治菁英的討論關係較爲頻繁。從政治菁英間政黨關係的同異質性觀之，同是國民黨的政治菁英比二者間是不同政黨的政治菁英，有較高的機率產生都市事務討論關係。換言之，同是國民黨的政治菁英形成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勝算比，是不同政黨政治菁英中存在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勝算比的 2.089 倍。從政治菁英彼此部門間的同異質性觀之，二者都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行動者，其形成都市討論關係網絡的勝算比，是二者均屬於不同部門背景行動者形成都市討論關係勝算比的 3.31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行動者間對偶關係特質差異與 4 種網絡連繫有無的邏輯迴歸分析

二者特質差異	事務討論		信任關係		技術諮商		資源交換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年齡差距								
正負 5 歲內	.518***	1.679	.720***	2.054	.635***	1.886	.908***	2.480
>5 歲（對照）	-	-	-	-	-	-	-	-
教育差距								
<3 年	.388***	1.474	.710***	2.034	.186	1.204	.033	1.033
正負 3 年內	.348***	1.416	.609***	1.839	.181	1.199	-.087	.917
>3 年（對照）	-	-	-	-	-	-	-	-
政黨同異								
國民黨	.737***	2.089	.239*	1.270	.013	1.013	.411**	1.509
民進黨	.088	.916	-.153	.859	-3.050	.047	.459	1.582
其他	-0.15	.985	.701*	2.016	.848	2.334	.142	1.153
不同黨（對照）	-	-	-	-	-	-	-	-
部門同異								
政府	1.197***	3.310	1.257***	3.514	1.209***	3.353	.819***	2.269
議會	.643***	1.903	.511*	1.667	.828**	2.290	.472	1.603
其他	-.430	.650	-.109	.897	.441	.644	-.540	.583
不同部門（對照）	-	-	-	-	-	-	-	-
派系同異								
張派	.418*	1.519	.275	1.316	-.827*	.437	-.113	.894
賴派	.341	1.407	.833	2.301	.756*	2.130	1.944***	6.984
其他	-.130	.87	-.668***	.513	.114	1.120	-.239	.788
不同派系（對照）	-	-	-	-	-	-	-	-
常數項	-2.744***		-3.705		-.376***		-3.874	
-2 log likelihood	5564.04***		3220.255***		2416.6***		2532.9***	
N	6006		6006		6006		600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001、**<.0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倍，而兩個政治菁英同是議會部門背景，形成都市討論關係的勝算比是二者屬於不同部門形成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勝算比的 1.903 倍，顯然在台中市政府行政部門內部在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同質化程度較議會部門強。相較於前述因素，派系同異質性對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僅有較弱的影響力，二者同是張派背景的政治菁英比二者不同派系有較高的機率形成都市討論關係（1.519 倍），前述已經指出張派有許多政治菁英很用心蒐集都市事務的資訊，由此也可佐證這種觀點。

同樣地，年齡差距、教育差距、政黨同異、部門同異、派系同異等因素也顯著地影響政治菁英間二者相互信任關形成的機率。2 個政治菁英若在年齡、教育、和部門上愈相近，對彼此間信任關係形成則更加有利，兩者同是國民黨也會有比較高的機率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此外，張派與賴派政治菁英間派系背景的同質化，並未顯著地影響兩者間信任關係形成的機率。進一步解釋，任兩個政治菁英的年齡差距若在正負 5 歲內，彼此間形成信任關係的勝算比，是二者年齡差距 5 年以上的 2.054 倍。請託者的教育程度比受託者教育程度低於 3 年以上，其形成信任關係的勝算比，是請託者比受託者的教育程度高出 3 年以上形成信任關係勝算比的 2.034 倍。同理，政治菁英二者間教育程度差距在正負 3 年內形成信任關係的勝算比，是請託者較受託者高出 3 年以上勝算比的 1.839 倍。政治菁英間同是政府部門形成信任關係的勝算比，是二者均屬於不同部門背景形成信任關係勝算比的 3.514 倍。值得關注的是，有些政治菁英並不包含在張派與賴派，這些同樣沒有派系背景的政治菁英形成信任關係的勝算比，是比不同派系背景的政治菁英形成信任關係勝算比的 .513 倍，可見得完全沒有派系背景的兩個政治菁英，彼此間的互動較無內聚力，自然也不太可能透過彼此間的信任關係動員政治資源。

對兩者間技術諮商關係形成機率的影響變項僅有年齡差距、部門同異、派系同異。政治菁英間若兩者年齡差距在正負 5 歲以內，其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勝算比，是兩者間年齡差距在 5 歲以上的政治菁英間的 1.886 倍。具備市政府部門背景的官員彼此尋求技術諮商是最明顯的現象，二者同是政府部門背景的政治菁英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勝算比，是不同部門的政治菁英形成技術諮商關係勝算比的 3.353 倍。再者，政治菁英兩者間具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員背景的行動者，其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勝算比，是不同部門政治菁英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 2.290 倍。政治菁英間的派系背景在技術諮商網絡關係上呈現出有趣的現象：第一、同是張派議員，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機率反而低，其勝算比僅是不同派系形成技術諮商關係勝算比的.437 倍。再者、反觀賴派的政治菁英，內部則反映了較強的技術諮商關係，兩者同是賴派的政治菁英形成技術諮商關係的勝算比，是不同派系政治菁英勝算比的 2.130 倍。從質化的資料顯示，這與賴派的政治菁英中有一些重量級的議員和專業的建商建築師有關，加上訪問執行期間賴派成員大半關懷土地重劃區的利益發展，需要彼此進行都市發展的專業技術諮商，透過內部諮商便有許多有效的資訊，當然也透露出賴派的政治菁英對都市空間使用與交換的技術法規知識是相當投入的。

影響二者形成資源交換關係機率的顯著變項有年齡差距、政黨同異、部門同異、和派系同異。首先、政治菁英間年齡的同質化，有利於資源交換關係，而兩者年齡差距在 5 歲內形成資源交換關係的勝算比，是兩者年齡差距在 5 年以上形成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的 2.480 倍。從政黨背景的同異觀之，同是國民黨背景也具有些微有利之處，當時在財力與人力的社會資源上，國民黨內仍有巨大的優勢進行政治、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故政治菁英間二者同是國民黨形成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是二者不同政黨形成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的 1.509 倍，但同是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對於形成一個有效的資源交換關係，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意涵，這某種程度上也顯示了在 1990 年代左右，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中市的財力資源與人力動員能力呈現了不對稱的差距。從政府部門背景同異觀之，政府部門內部也有資源交換的現象，相較於前三種網絡關係，政府部門官員對人力與財力等社會資源的交換關係並不算少，同是政府部門背景的政治菁英其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是不同部門政治菁英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的 2.269 倍。總的來說，對社會資源交換關係形成機率影響最大的變項爲派系的同異，特別是賴派背景的政治菁英間內部所形成的資源交換關係。同是賴派的政治菁英，其形成資源交換關係的勝算比，是不同派系形成資源交換關係勝算比的 6.984 倍。賴派內部如此緊密的社會資源交換關係，顯然與 1990 年左右台中市屯區重劃區開發，賴派成員在財力與人力上的支援行爲以進行土地利益的奪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取的現象有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從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的政治菁英網絡，與政治菁英間對偶關係距離的相關因素，和影響菁英兩者間有無產生關係機率的因素，可看出這些都市政治菁英的網絡關係確實蘊含了一些網絡關係運作的原理，也爲我們逐一剖析了影響解嚴前後台中都市發展方向的潛規則。

政治菁英各種類型的交換網絡的兩者關係距離是彼此高度相關的，特別是都市政治菁英的信任網絡和都市事務討論網絡。兩個政治菁英間對於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距離和信任關係距離有相關性最高，也就是說，菁英間若愈具有信任關係，則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也會愈近，可見對於一般性都市事務的資訊交換關係，與日常生活的信任關係有密切的關連性；其次彼此間的信任關係也和資源交換網絡關係相近，顯示了政治菁英間的彼此信任或許可作爲探究社會資源交換與動員關係的重要基礎，而相關性最弱的則是和技術諮商網絡的關係距離。換言之，技術諮商的關係比較傾向於制度性與專業性的互動，與其他信任與資源動員網絡等非正式交換關係距離相關較低，但以上的分析結果皆與理論上的預期有其關連性－信任是交換的基礎。

都市菁英間背景的同異質性原理與兩者間關係的關連性爲何？雖然在分析上，此一部份的顯著的相關係數均屬於輕微相關，但在解釋上仍然可以提供以下可供參考的信息。首先、教育背景同質性高，菁英間彼此建立信任關係的距離也較短，但在技術網絡關係與資源交換關係距離反而較長。此一結果顯示了教育背景的同質性與信任關係的維繫呈現正相關，但在技術網絡關係與資源交換關係上，不同教育背景的行動者交換關係較爲頻繁，這意味著技術諮商網絡和資源交換關係，與背景上的不對稱關係有正相關，不會都集中在高學歷或低學歷的政治菁英。據此，學歷的相似性或同質性與彼此信任關係的建立有正相關，這與相似吸引典範的觀點一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致，但並非與工具性交換關係的建立有正相關。再者，同政黨或同部門背景的政治菁英也有較短的信任關係距離，甚至在都市事務討論的關係、技術諮詢關係以及資源交換關係均有較短的關係距離，顯示了在政黨與政府部門的背景上，政治菁英間兩兩關係的建立與背景同質化有正相關，具有同黨或同政府部門的政治菁英彼此間或許好溝通好辦事，這也符合相似吸引典範的觀點。然而，同派系的政治菁英，分析的結果違反了相似吸引典範的觀點，不但在信任關係網絡的距離相對較遠，其他網絡關係也呈現了反向的關係，顯示了不同於政黨與部門的背景與同質化的分佈。在派系的背景上，關係的建立比較傾向於跨派系的異質性交換關係，而非僅僅單純限縮在一個派系之內。換言之，台中市都會政治菁英的 4 種社會關係派系化的現象並不明顯，許多菁英不屬於派系，也較常與不同派系背景的菁英來往，故不同派系的背景，與其在都市事務討論關係、信任關係、技術諮商關係以及資源交換關係的距離呈現負向的關係。

從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網絡的互動原理，可看出這些政治菁英之間的集權化現象並不明顯，在對偶關係的溝通聯繫上，有權力者容易以較短的社會距離連結有效率的溝通機制。台中市一向強調府會和諧，市長、市政府與議會的議員間在多重網絡的角色關係上，都出現相互依賴的鐵三角關係。由於過去台中市的地方政治深受派系的影響，市長或議會議員具有派系背景可能都不足爲奇，相互依賴的關係或許與派系政治的背景有其關連性。研究發現二者中若受託者聲望高，兩者在 4 種社會關係的社會距離也較短，但不如請託者聲望高的效果大。其次是若兩者中的請託者是具有政府官員背景的行動者，兩者的討論關係社會距離較短；反之，受託者是政府部門者，討論關係社會距離也短，此顯示具官方背景與都市事務討論關係呈現負相關。可見對有聲望或官方背景來說，與達成有效的都市資訊交換間呈現正相關。相對而言，其他的社會網絡關係也呈現了類似的影響機制，具影響力聲望與官方背景的行動者，無論在哪種網絡關係的社會距離都比較接近。

從解嚴前後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網絡菁英間的網絡關係與其解釋的因素檢視，雖然年齡、教育程度、政黨同異的因素，顯示了政治菁英間網絡的互動關係具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但派系同質性的因素並沒有影響到信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關係的建立，張派背景的政治菁英在技術諮商的關係上也較爲疏遠，此一結果顯示在社會關係的建立上，同樣派系的背景並非是主要的影響因素，這樣的分析結果，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派系的連結在地方政治影響機制的意涵，以及在解析政策網絡的影響機制時，跨派系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和橋樑者（brokerage）位置分析的必要性。從台中市都市發展的政策網絡中，可看出派系內部的聯繫距離和互動頻率並不如原先假設的如此封閉。解嚴後，地方派系爲了生存，採用跨界的弱聯繫與地方財團、政府部門、議會部門及建築業者策略性的擴大結盟能力，以在都市發展政策上產生較大的影響力。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 1990 年代左右的台中市，是屯區土地重劃最爲興盛的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的重劃區都在賴派政治菁英勢力範圍的屯區，故在資料蒐集期間賴派成員比較積極關懷和都市成長有關的事件，也比較積極動員技術諮商與資源交換網絡以累積其土地利益。

若進一步比較在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政治參與者 4 個社會網絡機制的影響因素，可以發現僅有年齡差距正負 5 歲以內，以及政府背景的變項在 4 個社會網絡中在統計上達到顯著，且勝算比明顯的高出對照組甚多，可見政治菁英年齡與官員背景的同質性，有助於成爲政治菁英在參與台中都市發展政策的過程中建立資源汲取與操作關係的條件。反之，在 4 個社會網絡關係的建立上，完全都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的變項，則有同是民進黨背景的變項與部門同異中其他（表示非屬行政與議會部們的其他背景行動者），可見具有這兩種背景的政治菁英，對於其在參與都市發展事件 4 種社會關係的建立完全沒有影響，在討論都市發展政策中對偶關係建立的影響因素可以忽略不計。在教育程度的變項中，教育程度同質性的因素僅影響了都市事務討論網絡與信任關係網絡的建立，特別是信任關係建立的勝算比高出教育程度異質性的對照組甚多；反之，在技術諮詢與資源交換關係的建立上，教育程度的同質性便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若對照前述相關分析的結果，教育同質性高的兩者較能培養出信任關係，但卻在資源技術諮商與資源交換的關係上距離較遠，邏輯迴歸的分析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學歷的相似性，對技術諮詢或資源交換關係的建立沒有顯著影響。至於派系的同異質性對 4 個社會網絡關係建立的影響，前段已經有初步的討論，在都市事務討論關係的建立上，僅有張派背景的政治菁英有達顯著，比不同

逢甲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派系背景的政治菁英勝算比高，信任關係網絡的建立，則是無論張派或賴派的政治菁英都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影響，反而是賴派的政治菁英，在技術諮詢與資源交換關係的建立，比不同派系背景的頻繁；反之，張派背景的行動者在技術諮詢網絡關係的建立非常鬆散，而張派背景對資源交換關係的建立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很明顯的反映出 1990 年代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中，張派與賴派政治菁英在參與都市事務上著力點的不同，賴派的政治菁英所積極建構的互動關係與行動模式，比較符合都市成長機器理論對都市政治菁英參與都市事務行爲的理論假設。

總的來說，本研究到目前爲止已經初步的解答了台中市於 1990 年代都市土地發展政策網絡與政治菁英背景同質性與異質性的關係，在 4 種社會關係的建立因素的討論上，除了派系背景的同異質性之外，多符合相似性／同質性的理論假設，也較一般的政策網絡研究，在量化經驗研究的層次上，更進一步的去探索了網絡結構的影響因素與都市發展政策的關係。雖然這個資料蒐集的時間是 1995 年，反映的網絡結構是 1990 年代左右台中市政治菁英在都市發展政策事務上的互動關係與背景，僅能對 1986 至 1992 年台中市的都市發展政策網絡進行推論，但從政策網絡理論中對於政策社群穩定性的角度來說（Rhodes and Marsh, 1992），行動者間在政策網絡的互動很有可能會成爲穩固且有效率的互動文化，並不斷地在後來的互動中被再製，即使台灣的地方政治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直企圖沖淡原本派系共治的治理結構，但派系在目前的地方政治生態中，或許仍然維持了一個重要政治動員的角色。這 20 年來台中市已經經歷了政黨輪替與政治勢力的重整，許多曾經參與過 1990 年代台中都市發展政策事件的政治菁英，可能都已經仙逝或影響力不負當年，即使派系的勢力仍有傳承，當時網絡的結構勢必已經發生了改變，從 2011 年始，台中市也走入「五都時代」的政治新局。雖然歷經了變化，本研究相信對於過去都市發展政策菁英間互動的分析，在現在的台中市地方都市發展政策的解讀仍具有參考意義，從台中市歷年都市計畫委員會穩定的名單中，便可察覺這種固著且穩定治理機制的組成仍然反映了背景同質性的基礎（王光旭，2005b）。換言之，穩定的互動文化仍然會形成一種慣性行動的機制，轉變成行動者間共享而形成的行爲腳本（script），這個由生活經驗中體驗學習的行動腳本，是型塑行動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慣性行爲結構的機制之一，這種潛規則也是任何政治人物進到地方政治的場域所必須學習的先修課。在分析的結果上，本文得知了跨派系的背景反而在社會關係的聯繫上顯現了相對較近的關係距離，顯然，在解嚴後台中都市發展政策各類型的交換網絡中，跨派系行動者的交換關係能以較短的距離彼此相連，可見跨派系的行動者將會是重要的政策溝通與資源交換的橋樑者。

二、研究建議

綜上討論，本文也提出兩點未來的研究建議，作爲進一步深化本研究的思考方向：一、在同一筆資料中，未來應該進一步分析地方派系在四種社會網絡結構中所扮演的橋樑者角色，以及網絡中結構洞分數高者的特質，及在都市發展政策行動上的意義。由於派系同異質性的分析結果，並不符合相似性／同質性的理論預期，反而是跨派系背景的政治菁英能夠建立起較親近的社會關係，可見得台中市的派系並非封閉的結構，爲何在 1990 年代的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會有跨派系型態政策網絡的發展，是否與解嚴後多元社會力參與地方發展政策的政治風氣有關？值得更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研究結果也可以與王振寰（1998）對於台中市都市發展的研究與觀察對話；二、若再一次以同樣的方法重新蒐集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菁英 4 種社會網絡的資料，可以針對前後兩筆資料所呈現的網絡關係結構的變化進行比較，檢視台中市都市發展的潛規則是否已經有所改變，才能從循證研究的角度，去解答兩個時期都市政治菁英權力結構是否發生質變的問題。網絡同質性的互動原理，資源交換不對稱性的互動規則或許大致不會改變太多，但由於目前台中市已經合併原本的台中縣擴大升格成五都之一，許多地方的派系勢力也已消退或重整，也許跨派系間的關係會比 1990 年時更佳彈性化，或派系背景政治菁英對都市發展的影響更爲式微，都還有待驗證。而原本在迴歸模型中不顯著民進黨背景的政治菁英對地方政治的參與，勢必會比 1990 年剛解嚴時更多，國民黨影響力的逐漸式微與政黨政治的興起，也致使民進黨的地方政治菁英更能涉入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菁英網絡的權力核心，若要瞭解現在台中市都市發展政策菁英網絡的互動結構，跨民進黨和各政黨內的菁英間的互動關係勢必要更被關注與解析。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光旭，2002，《制度、網絡與政策產出：臺中工業區聯外道路案之個案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光旭，2005a，〈政策網絡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的核心地位與方法錯位〉，《政策研究學報》，6: 61-102。

王光旭，2005b，〈都市計畫審議機制之制度分析：以臺中市爲例〉，《行政暨政策學報》，41: 35-80。

王光旭，2008，〈政策網絡的行動體系分析：以臺中工業區聯外道路案爲例〉，《政治科學論叢》，37: 151-210。

王光旭，2009，《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台灣中醫及牙醫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之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

王振寰，1998，《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

文崇一，1989，《社區的權力結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史美強、王光旭，2008，〈台灣府際財政治理的競合關係：一個網絡分析的實證研究〉，《公共行政學報》，28: 39-84。

邱瑜瑾，1996，《解嚴後台中市都市發展型塑的社會機制》，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秦蕙媛、管婺媛，2010，〈慘勝？……胡志強：選前三天派系要求輸血。金溥聰：我不收買派系〉，《中國時報》，12/3，A2。

陳明通，1990，《威權政體下台灣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86）：省參議員及省議員流動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臺北：巨流出版社。

賴志彰，1997，《投機城市的興起：戰後台中市都市空間轉化之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傅仰止，1999，〈核心網絡的他人聯繫與同質性〉，「台灣社會的個人網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屆研討會」論文（5 月 18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熊瑞梅，1992，《快速成長的郊區之菁英影響力結構及居民社會資源》，臺北：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

熊瑞梅 ，1994，〈影響情感與財務支持連繫的因素〉，《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2): 303-333。

熊瑞梅，1995a，〈社會網絡資料蒐集、測量與分析方法〉，章英華、傅仰止、瞿海源（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科技研討會論文輯》，臺北：中研院民族所，頁 313-356。

熊瑞梅，1995b，《台中市都市變遷：區位、政府及地方菁英影響力結構（II）－行動體系觀之分析》，臺北：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熊瑞梅，2001，〈都市事件行動體系的分析：以臺中市爲例〉，《台大社會學刊》，29: 59-110。

熊瑞梅、邱瑜瑾，1995，〈都市政治菁英的社會資源與社會圈：以台中市爲例〉，林松齡、王振寰（編），《台灣社會學研究所的回顧與前瞻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社會系，頁 47-102。

羅 珉，2008，〈組織間關係理論：理論研究的深度與辯析〉，周小虎（編），《中國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報告，2007-200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頁 17-27。

二、英文部分

Agranoff, R. and M. McGuire. 1998. “Multi-network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and the Hollow State in Local Economy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PART)* 8(1): 67-91.

Agranoff, R. and M. McGuire. 2003.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New Strateg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ogason, P. 2004. “Networks in Policy Analysi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http://www.ruc.dk/demnetgov_en/ working_ papers/. Lastest update 25 November 2010.

Borgatti, S.P. 1998. “A SOCNET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1(2): 37-46.

Brass, D. J. 1995. “A Social Networks Perspective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Persona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3: 39-79.

Burt, R.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eld, S. L.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6): 797-801.

Fischer, C.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laskiewicz, J. l979. *Exchange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Galaskiewicz, J. l989. “Interorganizing Networks Mobilizing Action at the Metropolitan Level.” In *Networks of Power: Organizational Actors at the National, Corporate, and Community Levels*, eds. Perrucci, Robert and Potter. H.R. Aldine de Gruyter, 81-96.

Gerber, E. R., A. Henry and M. Lubell. 2010. “The Political Logic of Local Collaboration in Regional Planning in California.” Paper prepared at the 2010 Duke Networks Conference, May 19-21, Duk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US.

Goldsmith S. and W. D. Eggers. 2004. *Governing by Network: The New Shape of the Public Sector*. Washington D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Goss, S. 2001. *Making Local Governance Work: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Gottdiener, M. 1987. *The Decline of Urban Politics*. Newbury Park, C. 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AGE.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1350-1380.

Granovetter, M. S. l985.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Hall, T. 2001. *Urban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Hall, P. and S. Montin. 2007.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Democracy at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in Sweden.” in http://www.ruc.dk/upload/application/pdf/f51d6748/Working_Paper_2007_9.pdf. Latest update 25 November 2010.

Hawley, A. H. 1950. *Human Ec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Hodge, G. A. and C. Greve. 2007.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7(3): 545-558.

Jessop, 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aboolian, L. 1998.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anagement vs. Administration Deb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8(3): 189-193.

Kaufman, R. R. 1974. “The Patron-client Concept and Macro-politics and Proble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3): 284-308.

Kickert, W. J. M., Erik-Hans Klijn and Joop F. M. Koppenjan. 1997. “Introduction: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Policy Networks.” In *Managing Complex Network: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eds. Kickert, Walter J. M., Erik-Hans Klijn & Joop F. M. Koppenj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13.

Klijn, E.-H. 1996.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 in Complex Networks: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28(1): 90-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noke, 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noke, D. and F. U. Pappi. l99l. "Organizational Action Sets in the U.S. and German Labour Policy Doma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4): 509-523.

Knoke, D., F. U. Pappi, J. Broadbent, and Y. Tsujinaka. 1996. *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 Labor Politics in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noke, D. and J. H. Kulinski. 1982. *Network Analysis*. London: SAGE.

Knoke, D., and S. Yang. 2008.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2nd ed.* London: SAGE.

Koppenjan, J. F. M. and Erik-Hans Klijn. 2004. *Managing Uncertainties in Networks: A Network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 and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Krackhardt, D. 1988. "Predicting with Networks: Nonparametr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yadic Data." *Social Networks* 10: 358-382.

Krackhardt, D. 1992.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eds. N. Norhria & R. Eccle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16-239.

Laumann, E. O.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aumann, E. O. and F. U. Pappi. 1976. *Networks of Collective Action: A Perspective on Community Influence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aumann, E. O. and D. Knoke. 1987. *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Social Choice in National Policy Domain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umann, E. O. and P. V. Marsden. 1982. "Microstructural Analysi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s." *Social Networks* 4: 329-3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umann, E. O., P. V. Marsden and J. Galaskiewicz. 1977. “Community-elite Influence Structures: Extension of a Network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594-631.

Lin, 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s. Marsden, P. and N. Li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31-145.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 M. C. M. and E. M. Otis. 2003. “Guanxi Civility: Processes, Potentials, and Contingencies.” *Politics & Society* 31(1): 131-162.

Logan, J. R. and H.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 122-131.

Marsden, P. V. and E. O. Laumann. l977. “Collective Action in A Community Elite: Exchange, Influence Resources, and Issue Resolution.” In *Power, Paradigms, and Community Research*, eds. R. L. Liebert and A. W. Imersheim. London: Sage, 199-250.

Marcussen, M. and J. Torfing. 2003. “Grasping Governance Networks.” in http://www.ruc.dk/demnetgov_en/working_ papers/. Latest update 25 November 2010.

McPherson, J. M. and L. Smith-Lovin. 1987. “Homophily in Volntary Organizations: Status Distanc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Face-to-Face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3): 370-379.

Mollenkopf, J. H. 1983. *The Contested City*.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lotch, H.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309-330.

Park, R.E. 195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rtney, and Watkins. 2000. *Foundations of Clinical Research: Applications to Practice.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Pye, L. W. 1995.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The China Journal* 34: 35-53.

Rhodes, R.A.W. 1997.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Rhodes, R. A. W. and D. Marsh. 1992.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Politics: A Critique of Existing Approaches." In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eds. D. Marsh & R. A. W. Rhodes. Oxford: Clarendon, 1-26.

Savitch, H. V. 1991. *Post-Industrial Cities-Politics and Planning in New Tork, Paris,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M. J. 1993. *Pressure, Power and Policy: State Autonomy and Policy Network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ssex: Harvester Wheatsheaf.

Stone, C. 1989. *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sui, A. S. and C. A. O'Reilly. 1989. "Beyond simple Demographic Effects: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al Demography in Superior-subordinate Dya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 402-423.

Wang, G. X. 2011. "A Debate on 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UK: Is Partnership A Better Way? "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4(1): 73-83.

Wasserman, S. and K.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t, J. A. 1982. *Urban Elites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The Dialectics of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itt, J. A. l989. "Organizaitonal Ties and Urban Growth." In *Networks of Power: Organizational Actors at the National, Corporate, and Community Levels*, eds. R. Perrucci and H. R. Potter. Aldine 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uyter, 97-110.

Williams, K. Y. and C. A. O'Reilly. 1998. "Demography and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A Review of 40 Years of Resear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 77-140.

Yang, M. M-H. 2002.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Q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170: 459-4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1 台中市八都市事件背景

事件	事件名稱	事件背景
一	綠川加蓋	市政府在成功路到中正路這一段的綠川加蓋，原意是作爲第一市場的臨時攤位，臨時攤位遷移至第一廣場之後，是市政府並未將綠川加蓋恢復原狀。在這個事件中，贊成的行動者大多是市政府的主管官員，以及張派和賴派的市議員，而反對的人數雖多，但動員密度低，較爲強調環境的品質與管制。
二	中心商業區實施單行道	台中市火車站前中心商業區實施單行道，影響中正路兩旁商家的生意，減少購物人潮，使當地商業區的機能日漸衰退，故兩旁的商家與部分的市議員推動廢除單行道計畫。
三	住宅區變更爲商業區回饋計畫	台中市政府於第二次通盤檢討時將有些住宅區變更爲商業區，依照內政部規定住宅區變更爲商業區的案子，必須提供 12%的公設用地。地方政府在都市計畫的法規與政策上，和內政部有很大的差異，地方的土地利益團體、市長、建設局長、市議員均反對此事。
四	放寬第八期豐樂里細部計畫容積率管制	台中市自第六期重劃區之後，中央規定重劃區必須實施容積率管制，地方人士認爲台中市第八期豐樂里細部計畫容積率管制標準太嚴格，主張放寬管制。因此，在此一事件中，大多的行動者都贊成要放寬容積率。
五	第十期重劃區附近的行水區納入重劃範圍	台中市第十期的重劃範圍位於大里溪的旱溪邊緣，按都市計畫法規定行水區不得納入重劃範圍，但第十期重劃範圍的行水區兩旁土地業主經協調後，反而將該區納入重劃範圍，把行水區解釋成溝渠。贊成的爲地方的地主、市長、市府官員、市議員等，主張土地利益的考量，但市長林柏榕也因此事件被判刑。
六	市政府主張第十一期重劃採公辦方式	台中市第十一期重劃區在北屯區四張犁一帶，在開發方式上有自辦或公辦市地重劃的爭議。大多數地方政治菁英贊成公辦，且認爲公辦較能增進都市發展的公共利益，較可保障個人或業主的權益，較公平公正，同時也較有效率，可行性高，合乎成本。贊成私辦的人數甚少，其則認爲公辦會損害到其個人的利益。
七	在台中市西屯區設立科技園區	經濟部擬在台中市西屯區筏子溪以西，西屯路以北設立面積約一千公頃的科技園區，雖然贊成的行動者較多，網絡的聯繫密度較大，但由於附近居民反對，且市長與爭取此一科技園區立法委員的競爭衝突關係，市長不願爭取科技園區的功勞由該立法委員所獨享，故此方案後來取消。此一事件可以說是第一個中央政府重大工程，在台中市遭致居民反對抗爭而作罷的公共建設。
八	綠 18 變更案	綠 18 是台中市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地點在存中街，忠明路一帶，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維持原來的都市計畫規劃爲綠地使用，但省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卻將綠 18 改爲住宅用地。這是一件台中市菁英集團反對將綠地變更住宅用地，卻遭省政府否決的案例。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附錄 2　受訪名單[5]

No.	姓 名	職　　稱	No.	姓 名	職　　稱	No.	姓 名	職　　稱
1	匿 名	內政部營建署長	2	匿 名	省地政處長	3	匿 名	省住都局長
4	匿 名	省建設廳長	5	匿 名	內政部都委會委員	6	匿 名	曾任市長
7	匿 名	曾任市長	8	匿 名	現任市長	9	匿 名	曾任市府主秘
10	匿 名	國宅局長	11	匿 名	工務局長	12	匿 名	地政科長
13	匿 名	建設局長	14	匿 名	財政局長	15	匿 名	主計室長
16	匿 名	民政局長	17	匿 名	市府養護課長	18	匿 名	都計課長
19	匿 名	代工務局長	20	匿 名	市府工務局技正	21	匿 名	市長計畫室主任
22	匿 名	市府法制室主任	23	匿 名	中區區長	24	匿 名	東區區長
25	匿 名	西區區長	26	匿 名	東區區長	27	匿 名	北區區長
28	匿 名	南屯區區長	29	匿 名	西屯區區長	30	匿 名	北屯區區長
31	匿 名	中區里長	32	匿 名	西屯區永安里里長	33	匿 名	西屯區福安里里長
34	匿 名	南屯區豐樂里里長	35	匿 名	北屯區軍功里里長	36	匿 名	北屯區水景里里長
37	匿 名	北屯區四民里里長	38	匿 名	北屯區同榮里里長	39	匿 名	臺中農田水利會
40	匿 名	臺中市黨部主委	41	匿 名	團管區司令	42	匿 名	逢甲、文化教授
43	匿 名	逢甲都計所教授	44	匿 名	逢甲環科系教授	45	匿 名	中興大學教授
46	匿 名	中興大學教授	47	匿 名	中興環科系教授	48	匿 名	東海大學教授
49	匿 名	東海大學教授	50	匿 名	律師	51	匿 名	國代
52	匿 名	國代	53	匿 名	立委	54	匿 名	立委
55	匿 名	立委	56	匿 名	立委	57	匿 名	立委
58	匿 名	省議員	59	匿 名	省議員	60	匿 名	省議員
61	匿 名	市議會議事組組長	62	匿 名	市議會前任議長	63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4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5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6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7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8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69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70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71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72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73	匿 名	曾任市議員	74	匿 名	現任議長	75	匿 名	現任副議長
76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77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78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79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0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1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2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3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4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5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6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7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8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89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0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1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2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3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4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95	匿 名	省建築師公會主任	96	匿 名	省建築師公會建築師
97	匿 名	臺中市建築投資公會	98	匿 名	臺中市建營造公會	99	匿 名	銀行同業公會理事
100	匿 名	市農會常務監事	101	匿 名	市商會常務理事	102	匿 名	台中消促會
103	匿 名	王建設	104	匿 名	鄉林建設董事長	105	匿 名	長億建設公司
106	匿 名	東帝士建設董事長	107	匿 名	瑞聯建設總經理	108	匿 名	龍邦建設董事長
109	匿 名	大排檔餐廳老闆	110	匿 名	現任市議員	111	匿 名	臺中市警察局長

[5] 名單中的現任意指 1994～1995 年的資料，第 112 名受訪者為訪談過程中所加入之受訪者。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3 問卷摘錄

【網絡溝通】

一、這裡有一份對臺中都市事件具有影響力的人的名單。請問您從曾文坡、張子源市長以來在都市事務討論上曾經與哪些人討論？是誰先主動提出討論？是否還有哪些人，您也曾經與他討論，但未列在上述名單上，請你補充。

二、在都市事務討論上，有時常會面臨一些比較敏感性的問題，需要和比較信任的人交換資訊，以便做決策。以下這些名單中，您和哪些人會彼此交換重要資訊？

三、請問您在都市議題或事務上，屬於法規性、專業性的技術問題，會向哪些人諮商？

四、請問您曾經從哪些人獲得社會資源（如財力、人力、設備、政治獻金的支援）？

五、請在下列名單中，列出您認爲對台中市都市事件最具有影響力的人，並請指認這些人所擁有的資源類型（最多複選三個）

1. 具有專業知識的能力
2. 個人或組織擁有大量資金
3. 具有運作金融機構資金的能力（如信合社、銀行）
4. 具有決策規畫權的政府官員或行政單位
5. 在台中市內及市外社會關係良好
6. 個人協調能力很好
7. 具有公信力的協調組織角色（如社區調解委員會、建築爭議委員會）
8. 有能力動員社會團體（如消促會、青商會、自救會）
9. 普遍受人尊敬，有能力動員一般民眾和輿論
10. 其它（請寫是什麼？）

六、以下都市事件誰最有影響力？

事件一：綠川加蓋

事件五：十期重劃

事件七：科技園區

總體都市發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組織特質】

一、請問您現在服務的單位：＿＿＿＿＿＿＿＿，民國＿＿年到這個單位服務，這個單位員工數＿＿＿＿人。

二、請您說明您的組織形式：＿＿。

1. 政府組織
2. 市議會
3. 教育研究機構（如：都市計畫系所）
4. 資源開發（土地開發、建商）
5. 仲介活動（仲介公司）
6. 商業及服務業
7. 專業組織
8. 商會
9. 公共利益團體

三、請您描述貴組織的主要活動及功能？

＿＿＿＿＿＿＿＿＿＿＿＿＿＿＿＿＿＿＿＿＿＿＿＿＿＿＿＿＿＿

＿＿＿＿＿＿＿＿＿＿＿＿＿＿＿＿＿＿＿＿＿＿＿＿＿＿＿＿＿＿

四、您所擁有的資源類型：（可複選）

五、請問您是否在別的組織也擔任職務：

六、貴組織誰在和市政府建立關係：＿＿＿＿＿＿。

七、貴組織有多少職員負責收集都市發展資料：＿＿＿＿＿＿。

八、貴組織收集資料的目的爲何：＿＿＿＿＿＿。

1. 提供給內部做決策
2. 提供給政府做決策
3. 提供給其它組織參考
4. 提供給民眾

九、您是否曾對政治人物（如台中市議員、省議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市長、省長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或競選上的幫忙）（可複選）：

姓　名　　幫忙類型

(1) 提供資金
(2) 作爲椿腳
(3) 作爲競選總部決策人員（總幹事、文宣等幹部）
(4) 作爲後援會人員
(5) 透過社團爲其爭取選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xplanatory Factors in Policy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Elite Networks in the Taichung City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Domain, 1986-1992

*Ray-may Hsung** *& Guang-xu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not only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 urban politic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but also seek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can shap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dependency, we identified four networks (urban affairs discussion network, trust network, technical advice network, and resource exchange network), interviewing 78 important actors involv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on eight critical urban development events. By calculating dyadic path distance between actors and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actors in the governmental sect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local factions, the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A short distance between actors in the urban affairs discussion network tends to be reflected in a similarly short distance in the trust network; (2) Actors from the KMT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more frequent interactions than other actors. In addition, actors from the Chang faction have more interaction in the urban affairs discussion network, while those of Lai faction have more frequent interaction in the technical advice and resource exchange networks; (3) The different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are not self-contained and actors operate across factional divisions; (4) Actors with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are dependent on actors with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or a strong reputation.

Keywords: Social Networks, Policy Networks, Dyadic Relationship, Urban Political Elites, Homogene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hsung@nccu.edu.tw.
**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guangxu.wang@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